

648844

Zhenshanmei  
di  
tansuo

2753

7125



# 真善美的探索

社会科学研究丛刊

封面设计 魏天禄

275

71

真 善 美 的 探 索

一九八二年七月出版

(《社会科学研究丛刊》十五)

---

|       |                 |
|-------|-----------------|
| 编辑出版者 | 《社会科学研究丛刊》编辑部   |
| 发 行 者 | 四 川 省 新 华 书 店   |
| 印 刷 者 | 四 川 省 军 区 印 刷 厂 |

---

四川省期刊登记证第064号

定价 0.89 元

## 目 录

|                       |                |
|-----------------------|----------------|
| 题材的选择与作家的责任·····      | 邓仪中 仲呈祥 ( 1 )  |
| 愿新形式探索者胸怀人民群众·····    | 李士文 ( 30 )     |
| 侦探小说、福尔摩斯及其他·····     | 洪 钟 ( 38 )     |
| 一个朴实的创业者形象            |                |
| ——评《青桐坡》的艺术特色···      | 木 斧 予 文 ( 45 ) |
| 真善美的探索                |                |
| ——谈近年来四川短篇小说札记 ·····  | 陈朝红 ( 53 )     |
| 试论高缨中短篇小说的艺术特色        |                |
| ·····                 | 常崇宜 田闻一 ( 69 ) |
| 爱情·生活·道德              |                |
| ——谈爱情题材创作中的一些问题 ····· | 吴 野 ( 82 )     |
| 新诗的转机·····            | 吕 进 ( 92 )     |

## 鞭挞生活中的假恶丑

### ——略论戏剧创作中反面人物形象的塑造

.....李庆信 ( 108 )

### “流行音乐”的历史状况以及的我一些看法

.....杨 琦 ( 127 )

文艺与个别.....林亚光 ( 142 )

论艺术的个性与真实性.....苏 恒 ( 158 )

真实性、倾向性及其它.....李敬敏 ( 171 )

试谈感情在艺术创作中的地位.....畅 游 ( 179 )

### 一个值得探讨的新问题

——应该怎样认识西方现代派.....王世德 ( 190 )

漫谈短篇小说的结构艺术.....李保均 ( 214 )

小说中不可代替的主角.....叔 敏 ( 225 )

编后记..... ( 239 )

# 题材的选择与作家的责任

邓仪中    仲呈祥

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指出：“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又强调说：“对人民负责的文艺工作者，要始终不渝地面向广大群众，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力戒粗制滥造，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益，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祝辞》）党中央负责同志的这些话，体现了党和人民对作家的充分信任，同时也大大加重了作家的社会责任感。近几年来，许多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坚持社会主义文学的党性原则，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他们总是注意从时代的需要、党的需要和人民的需要出发，在自己熟悉的生活基础上，严格选择题材，深入开掘题材，执着地向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进军，从而使自己的创作，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可是，也确有少数同志，把提出在“写什么和怎样写”的问题上“不要横加干涉”，有意无意地曲解为作家向党和人民“争”得的一种“自由”，曲解为作家在选择题材上可以随心所欲，不负责任，不顾效果。他们离开时代的要求、人民的需要，热衷于写身边琐事，热衷于“表现自我”，甚

至发展到把创作当作发抒个人不同政见或伤感情调的工具，并认为只有这样的作品才是“真正的艺术”。而在文艺理论研究上，在我们反对了“题材决定论”以后，又出现了“题材无差别”的理论主张。这种似是而非的理论主张，客观上又助长了创作中的不良倾向。

因此，文艺创作和理论研究的实践告诉我们：在写什么即作家选择什么样的生活题材的问题上，要不要强调作家的社会责任感，是一个直接关系到作家能否同时代结合、同人民结合，创作能否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原则问题。

—

我们的文学题材无比宽阔。随着新时期文学的日益繁荣，创作的题材需要不断扩大。但是，扩大本身并不是目的，更不是搞自由化，而是为了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从多方面更“认真地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反映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本质，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并且努力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给他们以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祝辞》）这就要求我们的作家自觉根据客观的需要和主观的可能，去严格选择题材，深入开掘题材，从各个方面来丰富创作的题材。

茅盾同志说：“创作的最重要条件是题材的成熟。”（《创作的准备》）漫步于生机盎然的新时期文学创作之林，饱览着郁郁葱葱的文苑胜景，我们深切地感到，许多作家在扩大创作题材上，坚持正确的方向，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做出了可喜的成绩。他们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选材严，开掘深，创作出了一大批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的好作品。这里，

仅以短篇小说为例，对这些作品在题材选择与处理上的主要经验，作一简要的分析。

在工业题材方面，继蒋子龙脍炙人口的《乔厂长上任记》（《人民文学》1979年第7期）之后，又出现了柯云路的《三千万》（《人民文学》1980年第11期）和闰水的《竞争者》（《小说选刊》1981年第6期）这样促人向上的好作品。这些作品在选择题材上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切到了时代的脉搏，迅速地反映了亿万人民群众共同关心的当前经济建设中的新矛盾和新斗争。经济建设是新时期工作的重点。它不仅由亿万群众直接参加，而且关系到亿万群众的切身利益。同人民命运息息相关、与时代脉搏共同跳动的作家，出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只要主客观条件许可，自然会把自己的艺术触角，伸进经济建设领域，探索和表现这个领域里新的矛盾、新的人物、新的人物关系，开拓文学题材的新天地。柯云路就说：“从提笔那天开始，我们把目光放到了社会性的重大题材上。我希望自己能够通过文艺作品，揭示社会的内部矛盾，揭示生活的内在辩证冲突，多少显示和描绘出历史趋向性的东西，写出时代自身的脉搏。我希望自己能够在读者面前尽可能展开广阔的社会风貌的图画。”（《展开广阔的社会风貌的图画——谈谈〈三千万〉的写作》，《小说选刊》1981年第5期）可见，正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促成作家选择了经济建设中的这样一个重要题材——某维尼纶厂围绕着追加投资“三千万”展开的一场要不要正确执行党中央关于工业改革方针的激烈斗争，塑造了丁猛这样一个血肉丰满的社会主义企业家形象，从而为进行四化建设的人们树起了一面火红的战旗。《竞争者》在题材的选择和开掘上，更向生活的纵深前进了一步。作家不仅

清醒地洞悉和把握了我国工业经济改革的新动向，了解了党中央提出经济改革的方针和政策以后，工业战线已经和正在发生的新矛盾，而且深入挖掘和发现了这种新矛盾中的新的人物关系。他认为：“要选择新的题材，决不仅仅是选择新的事件，而必须是在那事件中含着新的人物关系。”（《从生活中发掘新的人物关系——〈竞争者〉写作的前前后后》，《小说选刊》1981年第10期）因此，作家充分调动自己的生活积累，精心设置了季氏叔侄（他们都是共产党人、分别是两家工厂的厂长）在经济改革中所展开的一场社会主义竞争，维妙维肖地刻画了新形势下一位富有远见、勇于改革的工业干部与一位个人品质虽无所指责、但背着旧习惯重担又对改革不甚拥护的工业干部之间既竞争又联合的新关系。这种竞争，既不同于我国五、六十年代开展的那种“红旗竞赛”（竞赛的获胜者不过获得一面红旗，而竞争的胜败却直接关系到工厂的发展或挫折，关系到全厂职工的物质利益、利润分成和奖金），也不同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企业之间“大鱼吃小鱼”的竞争，因为双方的共同目的是联合起来，振兴社会主义祖国的工业。所以，这种社会主义企业之间的竞争，共产党人之间的竞争，这种时代前进到今天才特有的新的人物关系，不仅过去各种题材的文学作品中未曾写过，而且在过去的历史进程中也未曾发生过。这样，《竞争者》便写出了生活发展中初露端倪、牵动亿万人民心弦的新东西，为文学创作的题材领域，开拓了新天地。这个经验证明：作家只有认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真正切到了时代的脉搏，才能发现和选择那些体现时代精神的题材。

在农业题材方面，由于我们近年来反复强调了为八亿农民写作，因此这方面的短篇佳作，目不暇接；题材的开拓，

更是百花齐放、绚丽多彩。王润滋的《内当家》（《人民文学》1981年第3期），取材于当前阶级关系、社会关系正在发生新变化的农村生活，通过对“内当家”李秋兰——这位今天的主人接待过去自己当丫头时的“东家”（如今回国省亲的华侨）的生动描写，塑造了一位既坚持阶级立场、充满主人翁自豪感又懂得政策、胸襟宽阔的新型农村妇女形象。小说的确写出了“我们民族之魂”。但作家是怎样发现这一具有深刻现实意义的题材的呢？王润滋说，诱发他选择这一题材的契机，是生活中发生的这样两件事：

“……有个华侨老先生自海外归来，很多人毕恭毕敬地去见他。县里想要小汽车，公社想要大卡车，大队想要拖拉机，亲戚朋友一连那些几百竿子搭不到的都来了，要电视，要手表，要衣服，要……老先生惶恐了，他没有那么多钱。在海外，他只不过是一个看大门儿的……”

“一天，我回屋的一个同志去看戏，说是写中日友好的，很感人。可没散场他就回来了，脸阴得很厚。我问他怎么回事，他扔了手里的烟骂开了：‘我们应当发展中日友好关系，这是历史的潮流。可是过去日本鬼子杀我们的同胞，烧我们的房屋，强奸我们的妻女，我们的作家写到这段历史的时候，却只会唱樱花啊樱花！润滋，咱们也写……’说着，他眼里闪着火一样明亮的光。……”

——引自《写民族之魂——〈内当家〉创作断想》，《小说选刊》1981年第8期

多么发人深思的两件事啊！很清楚，正是人民的嘱托、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作家独具慧眼，发幽洞隐，开掘出《内当

家》这一体现民族尊严、爱国的诚挚的意蕴深沉的题材。尤为可贵的是，作家并未不加选择地把生活中实有的那两件事（素材）当作题材，原封不动地写进作品，相反，他由此引起联想，把丰富的生活积累与严肃的艺术思考结合起来，融进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理想，改造制作，提炼加工，写成了《内当家》这样一个具有浓烈民族情感和爱国热流的好作品。正如作家自己所说：“《内当家》要写的是我们民族的灵魂，那岩石般的不剥落不死灭的灵魂。这灵魂不是漂在水面，不是埋在地下，是附着在李秋兰这样的普通的中国老百姓身上。她（他）们脚踏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这块现实的土地上，硬是撑起了历尽风雨的共和国的大厦。”（《写民族之魂——〈内当家〉创作断想》）

即便同是描写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在农村实行了一系列新的经济政策，给八亿农民的生活带来深刻变化的作品，也由于作家对题材的选择和开掘的角度不同，呈现出千姿百态、各有千秋的风貌。譬如，赵本夫的《卖驴》（《钟山》1981年第3期），写普通农民孙三老汉在新政策许可的范围内，买了大青驴，当了收购站往县城运输的脚力，不仅对国家、对集体作出了贡献，而且给个人也带来了益处：三十岁的儿子说上了媳妇，原来准备给儿子换亲的闺女有了中意的婆家，新房的筹建也已开始，……这样，就真实地反映了新政策给农民生活带来的变化和农村的新面貌。这篇小说的成功，更主要在于作家并未停留在一般地描写农民的生活和农村的新面貌上，他把革命现实主义的笔触伸进了孙三老汉这类普通农民的心灵深处，通过对他山买驴到卖驴（怕政策一变，又被打成“暴发户”）的复杂内心矛盾的细腻描绘，深刻地揭示出这类普通老农在新的农村经济政策面前欣喜之余的一

种隐衷——担忧我们过去那种政策多变的历史再度重演，渴望顺从民意的新政策能长期稳定。题材开掘到这一步，作家观察生活的精细、思想见解的不凡，已经令人叹为观止。可是作家对题材的开掘并未到此止步。他进一步通过对孙三老汉由卖驴到决心不卖驴的复杂内心世界的揭示，让孙三老汉在现实生活的启示下坚信新政策“合民意”、“不会变”，从而既准确地表现了普通农民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赖和忠厚纯朴的本质，又深刻地反映出新政策已深入人心，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张一弓的《黑娃照相》（《上海文学》1981年第7期）和高晓声的《水东流》（1981年2月21日《人民日报》）也是写新政策给农村带来的新变化的。但作家对题材的选择角度显然与《卖驴》不同。这两篇作品都擅长抓住农民提高经济收入后的一些活灵活现的动人场面，小中见大，见微知著，理出社会生活的脉络，展示出新政策给农民带来的振奋和希望，表达新形势下普通农民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不断增长的要求。在这类题材的选择和开掘上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周克芹的《山月不知心里事》（《四川文学》1981年第8期）。这篇小说，虽也写新政策给农村带来的新变化，但却别有一番深意和韵味，耐读耐想。小说也写农民对新政策的“忧虑”——但却不是孙三老汉式地忧虑政策是否会变，而是因支书容儿忧虑责任制实现后，农民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各家各户做庄稼”，那么集体的事情、种子实验小组等等今后谁来管？小说也写了农村姑娘的“心事”——但却不是如不少小说写的新政策实行后收入增加，有条件去寻觅一位理想的爱人之类的心事，而是“心里装着比父母兄嫂们更丰富得多的东西”的农村青年对新生活的开拓和对社会主义锦绣前程的憧憬。小说不落窠臼，催人奋进，披露了现实

农村普遍存在、亟待解决的新课题，讴歌了坚持用共产主义理想光辉照亮人们心扉、走在生活前列的一代奋发进取的新人。人不可没有崇高的理想，生活不可失去远大的目标，作品不可缺少体现崇高理想的形象和展示远大目标的思想。周克芹之所以能深知历史的动向，深知农民的心，及时发现现实生活中最新最美的事物，敏锐开掘出富有新意的题材，写出《山月不知心里事》这样激励人们去开拓新的里程、引导人们向着更高精神境界奋进的好作品，关键正在于他坚持了社会主义文学的党性原则，在于他懂得“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社会责任，因而真正做到了如胡耀邦同志所说，在题材的选择和开掘上“从一般的日常生活”“进入到更深刻的更有重大普遍意义的社会生活里面去”，“进入到各种人的内心世界里面去”。（《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此外，过去在创作上一直显得薄弱的商业题材的小说，近年来也有了新的突破，出现了象航鹰的《开市大吉》和《金鹿儿》（均见《小说选刊》）等优秀篇什。《开市大吉》取材于新时期的街办商店，反映了广开就业门路的新面貌；而《金鹿儿》则取材于国营商店，塑造了具有八十年代青年特点的模范售货员金鹿儿的形象。她不仅“工作泼辣，干活麻利，肯钻研业务，营业额一直是多的”，而且爱美，对生活和荣誉有独特的见解。这是一个有个性、有棱角、颇具时代风采的人物。她在商业战线努力改进服务质量、提倡“五讲四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今天，很有典型的教育意义。这两篇小说，在题材选择上都令人耳目一新。青年作家陈建功的力作《飘逝的花头巾》（《北京文学》1981年第6期）为青年题材的小说，开辟了新领域。这篇小说，不是重复过去许多作品都已表现过的当代有志青年如何在逆

境中奋进的题材，而是把笔触伸进了一个新的天地——在新现实面前，那些在逆境中曾经奋进的青年，为何在处境改善之后，又出现了新的思想上、道德上、人生信仰上的分化？先前的奋进者，有的何以开始沉沦？后起的觉醒者，如何继续奋进？坚实的青年，怎样才能抵抗生活的“浊流”的污染、永葆奋进的青春？怎样才能振兴中华的激流中，找到新的“奋斗支点”？所有这些，都是这篇小说形象地为读者所提供的新东西。陈建功说得好：“让别人去作生活的骄子吧，我们的使命却永远是开拓。”正是这种对生活负责的开拓者的胆识，使作家能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发现新的题材，写出独创的作品。

以上，我们概略地评述了近年来短篇小说创作在反映当代最迫切的题材——四个现代化建设方面的成功经验。这是因为：第一，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重点论，如胡耀邦同志提出的，这方面的题材，对于我们来说，尤其显得重要、迫切，值得“大写特写”（《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第二，我们文学创作的实际情况说明，这方面题材的作品，相对地说来是太少了，太不能适应时代和群众的需要了。所以，有必要呼吁加强这方面题材的创作。这里，并不意味着排斥和贬低历史题材和其它题材作品所取得的成绩。相反，如姚雪垠的《李自成》，蒋和森的《风萧萧》，凌力的《星星草》等历史题材长篇小说所取得的思想、艺术成就，都是有目共睹的。

别林斯基在谈到作家的社会责任时曾指出：作家要想获得成功，“只有才能是不够的，还需要在时代精神上发展起来。……社会已经不愿意把他看作一个娱人的角色，而要他成为它的精神和理想生活的代言人；成为能够解答最艰深的

问题的预言家；成为一个能够先于别人在自己身上发现大家共有的病痛、并且以诗（注：泛指文学）的再现去治疗这种病痛的医生。”（《阿波朗·迈依科夫的诗》）车尔尼雪夫斯基也说：“只有那些在强大而蓬勃的思想的影响之下，只有能够满足时代迫切要求的文学倾向，才能得到灿烂的发展。”（《俄国文学果戈理时期概观》）近年来文学创作繁荣发展的经验证明，一个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在今天理应责无旁贷地严格选择题材，深入开掘题材，表现时代精神，努力使自己的创作满足时代的迫切要求，满足人民群众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精神需要。

## 二

无庸否认，在题材的选择问题上，近年来也确实还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不良倾向。

在创作上，有的同志错误地把题材应当扩大理解为“题材无差别”，甚至曲解为“题材自由化”。他们对描写人民群众进行四化建设的题材不感兴趣。他们忘记了或不懂得文艺与时代结合、文艺为人民服务，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性质决定了的。他们在选择题材上的一个严重失误，便是脱离时代和人民的需要，缺乏应有的社会责任感。他们热衷于写什么题材呢？有的热衷于写身边琐事，儿女情长，“表现自我”，发抒个人一时的感伤情调或失恋的苦闷，并以这小悲欢为大千世界。有的热衷于见啥写啥，展览秽行，搞自然主义，美其名曰“真实”。有的看“行情”，观“风向”，投合市好，追求刺激，脱离生活，瞎编乱造——编荒诞故事，什么父女热恋，母子同居，低级庸俗，不

堪入目，编爱情故事，什么三角恋爱，多角恋爱，爱人一个，情人多个，争风吃醋，乌七八糟；编海外故事，什么离奇巧遇，功成名就，终成眷属……。有的离开作品的内容，离开民族化大众化，生搬硬套外国的东西，单纯追求所谓的形式创新，题材平庸肤浅，描写所揉造作，令人不知所云。还有个别同志走得更远，或通过人物的空洞说教，表达和支持那些持不同政见者的观点；或塑造所谓的“探索者形象”

这种“探索者”，虽也仇恨“四人帮”，不满左的倾向，反对个人崇拜，但却往往不信赖现在党中央的领导，不拥护三中全会制定的方针、政策，力图摆脱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轨道，去“探索新的救国良方”；或歪曲、丑化现实，表达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怀疑。如此等等。这里，为了说明问题，仅以李剑同志的几篇小说为例，从题材选择的角度，略加分析。

写过《“歌德”与“缺德”》的李剑同志，近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写了好几篇他自己先前痛斥过的那类“缺德”小说。这些小说，一类取材于十年动乱时期的社会阴暗面，一类取材于粉碎“四人帮”后社会生活的弊病。不是说，生活的阴暗面不能作为创作的题材；而是说，李剑在选取这些题材的时候，根本丧失了一个作家对创作、对人民的文艺事业所应有的起码负责任的态度。题材对李剑说来，不是从生活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对生活素材进行提炼、加工的结果，而是杜撰生活，借以迎合少数人低级趣味的产物。第一类写十年动乱生活的小说，如《醉入花丛》（《湛江文艺》1980年第6期），编造了这样一个故事：在串联中掉队的女红卫兵叶丽，夜宿于一个单身汉“雇农”家，当这个“雇农”企图奸污她时，她虽本能

地感到恐惧和厌恶，却因马上想起了“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从而“灵魂深处爆发了革命”，决心“急贫下中农所急”，不仅顺从，而且同这个“雇农”结了婚，被树为“扎根农村”的“先进典型”广为宣传，以后又被地委书记奸污，受到百般凌辱，醉卧于油菜花丛，茫然不知归宿。作者描写这样的带着浓厚主观随意性的题材，强行把现代迷信的狂热与女红卫兵献出“贞操”、把“同贫下中农结合”与满足“肉欲”拉在一起，其目的，无非是说：“最高指示”造成了这场悲剧。这种对毛泽东思想的庸俗玷污，实在令人愤慨。另一篇《竞折腰》（《河北文学》1981年第2期），也把某知青农场在围海造田中发生的一场数百人葬身的大悲剧，归咎为“最高指示”——“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坑害”。不知：作者杜撰出这样的题材，究竟有什么生活依据？其立场究竟站到哪里去了？至于另一类写新时期生活的小说，也把现实描绘得昏暗阴沉。《花间留晚照》（《滇池》1980年第5期），写一个女青年，由于得罪了上司的夫人，受到人身攻击；《古堡女神》（《鹿鸣》1980年第5期）也写一个女青年由于画一幅维纳斯像，遭到诬陷。而生活对这两位无辜者，都冷酷无情，竟然没有一个人同情她们、理解她们，以至逼得她们一个跳崖，一个服毒，双双自杀。这样的作品，令人压抑，叫人沮丧，动摇人们对前途的信念，本身也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歪曲。还有，充斥于这些作品中色情、卑琐、猥亵、恐怖的场面描写，则更具体地反映了作者在选择题材上审美趣味的污垢。李剑创作失败的教训，在于背离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离开了党和人民的需要，忘记了作家神圣的社会责任感，而错误地把文艺当作了个人投机成名的工具。这

样做，于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于个人都是有害的。

必须指出，在选择题材上的不良倾向，同我们在文艺理论上的一些似是而非的主张是有一定的关系的。事实上，理论研究上有的错误主张，客观上助长了错误的创作倾向。例如，有一种相当流行的观点，认为作家只要写熟悉的生活就行了，即使有所选择，也仅仅是由于艺术构思的需要，“丝毫也不意味着社会生活中有些现象根本不能成为文艺的描写对象”。因为在生活中，“只有尚未被描写到的生活现象，没有不能成为文艺描写对象的生活现象”。言下之意，作家没有必要去区别题材和选择题材，更没有必要去熟悉那些迫切需要熟悉和表现的题材。这种看法，显然为创作中见啥写啥的自然主义倾向和对任何生活现象不加选择的倾向，提供了理论依据。

作家写什么，当然要从熟悉的生活出发，但同时也必须有所选择。这种选择，一方面是因为每一部创作都不能包罗万象，对生活题材必然有所取舍；另一方面，也因为生活题材本身，原本就存在着差别。

生活题材要选择作家。这也正是因为生活题材本身存在差别。而这种差别，是由于客观事物的矛盾运动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上各种物质运动形式，自然界的、社会的，都有其不同的特殊矛盾；同一运动形式中所包含的不同发展过程，也各有其不同的特殊矛盾；同一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又各有其不同的特殊矛盾。事物矛盾运动的特殊性，就表现为事物的差别。

生活题材，从宏观到微观，从火热斗争到身边琐事，纷繁复杂，千差万别。其中，有些显然是不宜于进入文艺作品的。鲁迅就说过：“譬如画家，他画蛇，画鳄鱼，画龟，画